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七一期 ——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010c)

【当事者言】	粉碎“四人帮”时接管光明日报社的经过	孙中范
【史实探讨】	关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几个问题	卜伟华
【人物春秋】	江青的亲情世界(上)	杨银禄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当事者言】

粉碎“四人帮”时接管光明日报社的经过

• 孙中范 •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了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决定迅速接管由“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先后调集耿飚、迟浩田、郑屏年、刘西尧等12位同志，临时进驻中央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等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关于中央在特殊时期的这一重要措施，诸多著述已比较翔实记述了耿飚、迟浩田等人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广播电台、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社的情况，而关于接管光明日报社的经过则比较鲜见。《光明日报》虽不属于“两报一刊”，但因为特殊原因，中央对《光明日报》同样高度重视。我当时是中组部核心小组成员、组织部负责人，作为当年中央派驻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的成员、那段历史的主要当事人之一，我觉得有必要把亲历的这段历史说清楚，以供后人研究。

◇ 非常时刻的非常之举

197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王洪文咬住中组部不放，要求就“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特别是组织路线，对组织部有哪些影响，联系组织部的实际，深入揭发批判”。10月7日下午2时，我正在修改中组

部给中央的检讨报告，时任中组部负责人的郭玉峰打电话通知我，让我带上洗漱用具尽快同他一起去中南海。在路上，郭玉峰对我说，中央领导同志找我们谈话，中央有新的任务交给你。由于对“四人帮”隔离审查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当时根本没有往这方面想，也猜想不到会是什么任务。根据多年在中央机关工作养成的习惯，我没有告诉家人，家人因为我走的急而且反常，一直担惊受怕，直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正式公布。

到了中南海紫光阁，华国锋、纪登奎、苏振华正在会议厅同迟浩田谈话，工作人员让郭玉峰和我到休息室等候。过了一会儿，当时在国务院值班室工作的王维澄来了，他消息灵通，偷偷地告诉我：昨晚中央把“四人帮”抓起来了。这时，纪登奎从会议厅出来，他让我和王维澄给人民日报社的鲁瑛、新华社的解力夫、光明日报社的莫艾打电话，通知他们3人立即到紫光阁，说中央领导找他们谈话。并嘱咐，他们来后由警卫安排，一个人安排一个房间，不要他们碰面。

华国锋同迟浩田谈完话后，有事离开了紫光阁，纪登奎、苏振华两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代表中央在会议厅同郭玉峰、王维澄和我谈话，主要是纪登奎讲。他说：“在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抓紧篡党夺权活动，昨晚中央采取措施将‘四人帮’隔离审查。中央政治局昨晚开会，一致推举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说着，他还给我们看了毛主席亲笔写的“你办事，我放心”的复印件。“由于宣传口长期被‘四人帮’把持，为防止意外，中央决定对宣传口各单位采取特殊措施。耿飚同志已在昨晚进驻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决定派迟浩田、孙铁青进驻人民日报社，郑屏年进驻新华社，刘西尧和你们两位进驻光明日报社。刘西尧现在出差在外地，已通知他迅速回京，你们俩先进驻。由于目前的情况比较复杂，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还不能马上公布，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你们进驻报社的任务有三项：一是把住报纸的关口，从今天起再有宣传‘四人帮’的字样；二是把报社的队伍稳定住；三是在中央正式公布粉碎‘四人帮’后领导报社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报社原领导小组在你们的领导下工作。”纪登奎谈话后交给王维澄和我一份由华国锋事先亲笔签署的文件。文件写道：

中央决定：派刘西尧、王维澄、孙中范三同志为中央派驻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刘西尧同志任组长，报社的一切工作都要由临时领导小组决定。

◇ 临时领导小组成员的选定

接着，纪登奎又对我说：“小孙你很不简单，在‘四人帮’猖狂一时的时候，你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坚持实事求是，没有跟风跑。”纪登奎说这话是有所指的，于是我明白了选我做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成员的原因。

党的十大以后，王洪文以接班人的身份抓工青妇的筹备工作，借机提拔、安插了大批造反派出身的“小兄弟”。1975年，经中央批准，借鉴四届全国人大筹备工作的经验，纪登奎指定我组建了工青妇组织组，负责工青妇筹备的具体工作。不久，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听到王洪文提出“不要小绵羊”的口号，就亲自过问，将工青妇的筹备工作主导权从王洪文的手中夺了回来。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对工青妇三个班子进行了调整，拿掉了影响很坏的一批造反派头头，增加了王崇伦、马恒昌等劳动模范。对此，王洪文、江青非常不满。工青妇筹备工作成为当时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四人帮”进行政治斗争的一个战场。

从1975年11月2日至1976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邓小平（在社会上还未点名，叫“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时，金祖敏以工会筹备组的名义揭发我，说我曾任工青妇筹备组会议上传达过邓小平“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的言论，此论后来收入“梁效”编印的《邓小平言论100例》，流传全国。“四人帮”对金祖敏的揭发如获至宝，王洪文在1

1976年1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兴师问罪地追查此事。1976年2月25日，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公开点名批邓小平。“四人帮”把金祖敏诬陷邓小平的言论作为反对毛主席的罪证加以批判，王洪文再次在政治局会议上追查此事。

在3月29日纪登奎找郭玉峰和我商量后，3月30日下午，由郭玉峰召开中组部核心小组会议，我从检查工青妇筹备工作中有关问题的角度发言，详细说明了邓小平有关对工青妇筹备工作的谈话内容及传达贯彻的真实情况。发言的核心是否定了“四人帮”及其爪牙对邓小平的诬蔑和攻击，公开说明邓小平没有讲那句话。会后把我的发言印中组部核心组简报送中央。在给纪登奎送简报的同时，还附上了我整理的《邓小平同志关于工、青、妇筹备工作和领导班子的谈话记录》原件备查。6月11日，王洪文对中组部作了“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批示，他对邓小平关于工青妇的谈话死死抓住不放，对我的发言简报更是气急败坏。纪登奎曾告诉我说，“王洪文看了你们的简报很生气，并要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工、青、妇筹备工作和领导班子的谈话记录》原件进行核对。王洪文还说：‘看样子孙中范已经陷得很深了，你们要帮助他转弯子’。”

因为王洪文的点名批判，我在中组部作了两次检查，并已经做好了被关押批斗的准备。因此，10月7日，郭玉峰通知我带洗漱用具到他办公室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自己要被隔离审查了，而绝没有想到是被中央派去接管光明日报社。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去看望纪登奎的时候，纪登奎曾和我谈起当年选定接管新闻单位人选的过程。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商定的，随后中央委托当时分管组织工作的纪登奎选定接管其他新闻单位的人选。纪登奎当时主要是和李先念等商定并报中央批准确定的人选，每个新闻单位派驻的人都由华国锋亲笔签署文件。

刘西尧任中央派驻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组长，就是李先念提议的。刘西尧1934年入武汉大学物理系学习，抗战期间参加学生运动，后投笔从戎，在新四军从事军政工作，为李先念所熟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工作于工业和国防科技建设领域，参与领导“两弹一星”的研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任周总理联络员，联系中科院，后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深受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信任。而《光明日报》是面向知识界、科技界、教育界的报纸，有科教工作背景的刘西尧无论从政治立场、政策水平以及资历、能力上，都是最合适的人选。

王维澄也是李先念推荐的，到光明日报社后不久，因为工作需要被李先念调回，刘西尧看中组部调来了赵振清。赵振清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中组部二处处长（当时中组部是部、处两级建制，二处相当于后来的地方干部局），“文化大革命”后期任二机部政治部主任，为刘西尧所熟悉，后来先后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中组部副部长。非常巧合的是，赵振清1964年曾倡议并组织实施了从大学生中选拔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工作，我就是那批被选拔的60名大学生之一。因此，赵振清可以说是我工作上的引路人。

◇ 接管光明日报社的经过

纪登奎等同我们谈话后，又分别向鲁瑛、解力夫、莫艾宣布中央的决定。他在同莫艾谈话时，没有直接提到粉碎“四人帮”的事，而是非常严肃地说：“我们受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的委托同你谈话，中央原来领导你们的那个人不再领导你们了，中央决定派刘西尧、王维澄、孙中范三同志组成中央派驻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从现在起报社的一切工作你们都要请示他们同意后再办，你要配合他们的工作，这也是中央对你的考验。”他说完让我将华国锋亲笔签署的文件给莫艾看。这时，莫艾的表情十分紧张，他看完文件后表态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按照纪登奎的安排，谈完话后，我同王维澄一起坐莫艾的车来到光明日报社，并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我们到报社后告诉莫艾：从今天起我们要天天看报纸的大样，经过审阅修改定稿后报纸才能付印。报社的经常性工作仍由你们负责，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商量。莫艾问：是否要开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宣布中央的决定？我们说：先不急着开大会，等刘西尧同志来后再定，你可在报社领导小组范围内宣布一下。莫艾立即通知开了一个几分钟的报社领导小组会议，我同王维澄和领导小组成员见了面，莫艾宣读了华国锋亲笔签署的文件，并告总编室从现在开始每天报纸的大样要送王维澄、孙中范审定后才能付印。他还说，大家有什么问题都要向他们请示。会后，莫艾迅速让报社为王维澄和我安排了办公室，总编室送来了明天出版的报纸大样。从此，我们就天天看大样，成了《光明日报》的“把关人”。

10月9日，刘西尧赶回北京，华国锋接见了之后，迅速来到报社听取了两天的情况汇报，对工作作了安排。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四人帮”掌握了舆论阵地，报纸大量篇幅是宣传“四人帮”和批判邓小平的内容，在中央没有公开粉碎“四人帮”之前，要在报纸上取消这些内容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有些文章改动一下还可以用，有些文章必须撤下来另补文章。有时手头没有可用的文章，只好多选用新华社发的通稿，这对《光明日报》来说不是个办法。刘西尧听了汇报后说，在中央没有公开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之前，先组织报社人员多编辑一些科学技术方面的稿件。我把刘西尧的意见告诉莫艾，他领会了这个精神，很快组织了一批备用稿件，这招还很管用。

10月11日是我们进驻报社的第5天，这几天中央派人审改报纸大样的情况已经在报社上下传开。虽然没有向报社宣布什么，但报社的工作人员凭借多年宣传工作的经验和高度敏感性，已经觉察到中央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我当时的日记记录：“这一天总编室送来的报纸大样已经没有宣传‘四人帮’的文章了，这样审改起来比前几天容易得多了。晚上到新华社发稿截止时，第二天报纸的版面很快就定下来了，凌晨2时大样审定稿就退给总编室安排付印。这是我们到报社睡觉最早的一天。”

到1977年1月，光明日报社的运动和业务都已走上正轨，中央同意派驻光明日报社的工作可以结束，准备正式任命光明日报社的领导班子。在酝酿报社领导班子时，刘西尧曾考虑为了保持报社工作的连续性，希望我留在报社的领导班子中。我说我没有做宣传工作的经验，临时领导小组结束后还是回中组部。我征求了赵振清的意见，他也赞成我回中组部。刘西尧同郭玉峰交换意见时，再次提出希望我留在报社领导班子的想法，郭玉峰当场表态，还是让我回中组部。1月14日，经中央批准，派范戈等3人到光明日报社，重组报社核心小组，范戈任组长、报社社长。1月20日报社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宣布中央任命。1月22日，报社召开核心小组扩大会议，刘西尧讲话，对中央派驻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的工作作了简要总结，正式同范戈等核心小组交接。会后，刘西尧和我等临时领导小组成员撤离光明日报社，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胜利完成了历史使命。

◇ 实事求是处理莫艾的问题

我们接管光明日报社的时间前后有108天。在接管的日子里，有一件事很值得一提，就是追查《光明日报》刊发“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的经过，并对报社负责人莫艾和孙关龙进行审查。2005年，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专门采访了光明日报内部原主任、曾参与审查莫艾的王忠人，就莫艾和那段历史做了一期节目。我看后感觉，王忠人的讲述总体上是真实的，是符合历史的，但因为王忠人当时所处的位置不够核心，有些细微之处不够准确，比如讲是“郭玉峰找莫艾谈的话”等等。王忠人口述的历史遗漏了一个重要事实：刘西尧任组长的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在主导对莫艾和《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发表过程的审查中，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调查否定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办》一文是“四人帮”授意制造的“反党夺权的信号”的说法，辩证地看待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特殊历史情况下出现的问题和犯错误的同志，率先提出了解除对莫艾等人隔离审查的意见，保证了报社“揭、批、查”运动没有过多伤害干部，从而使报社的各项工作快速、稳妥地走上了正轨。也就是说，在领导报社揭批查工作时，我们没搞“左”的那套，这在当时也是冒了很大风险的。

1976年10月7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上点了《光明日报》的名。10月17日，刘西尧向我们临时领导小组成员传达了华国锋的讲话：“更为恶劣的是，他们有计划有预谋地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大造舆论。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清华、北大用‘梁效’名义写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文章别有用心地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光明日报》的文章，影射、攻击我‘篡改’、‘背叛’，要把我们打成叛徒。”刘西尧讲，华国锋认为，《光明日报》发表“梁效”“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是“四人帮”反革命夺权的信号，之所以下决心在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就是看到这篇文章（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和刘西尧曾戏言，如果历史地看，这篇文章刊发反倒是坏事促成了好事）。所以，中央领导同志决定要对莫艾及组稿人孙关龙办学习班隔离审查。我们商定由师海云代替莫艾主持报社日常工作，张常海负责总编室的工作。刘西尧让我起草了给中央的请示报告。10月18日，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报社开大会宣布中央批准给莫艾、孙关龙办学习班。同时，因王维澄另有重要工作，被中央领导调走，时任二机部政治部主任的赵振清和老干部王介福被调来到报社负责清查工作。

对莫艾等人的审查重点，放在他们与“四人帮”的关系问题上。经过各方面调查，临时领导小组的同志认为：莫艾同姚文元只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没有单独的组织联系。特别是当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后，莫艾主动把自己在光明日报社三年的工作记录、电话记录（包括姚文元的谈话）、来往信件等毫无保留地上交，态度还是端正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是报社根据当时中央的宣传要求自己决定约的稿，不是姚文元等授意的。“梁效”的初稿是9月24日写出，9月30日莫艾签发定稿版面，定稿时间是在华国锋10月2日戳穿伪造遗嘱阴谋的前3天。这就排除了文章是“四人帮”针对华国锋批示而授意写作和发表的问题。因此，文章的发表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

经历过那个年代、稍有点儿政治斗争经验的人都知道，作出这样一个结论是要冒风险的。因为当时党中央主席已经对此定了性，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在各大报刊发的批判文章中，莫艾也已经成了“四人帮”的“喽罗”和“亲信”。刘西尧多次召开临时领导小组会议，反复讨论专案审查情况。我们一致认为，莫艾问题属于执行“四人帮”宣传工作上的路线错误，纵观他的全部历史，还不能说他是“四人帮”的骨干。于是，我们在撤离报社前给中央宣传口写了报告，建议结束对莫艾、孙关龙的隔离审查。中央宣传口不同意提早结束隔离审查，此事后移交给报社新领导班子处理。1978年12月16日，经中央宣传部批准，莫艾才被解除隔离，结束审查。1981年12月28日，中共光明日报社编辑委员会经中央宣传部批准对莫艾作出审查结论。结论第一部分采用了我们当年经过调查和反复讨论的结果，第二部分对莫艾主持光明日报社工作期间所犯的其他错误进行了认定（这应该是我们撤离报社后对莫艾继续审查的结果），最后的处理意见是不予处分。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是“考虑到莫艾同志的上述问题，基本上是公开宣传报道方面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又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受‘左’倾错误影响发生的。因此决定：不予处分。”应该说，中央对莫艾的审查结论和处理决定是客观、公正的，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党的正确的干部政策。

108天，在《光明日报》的历史上是短暂的，但令我们感到非常欣慰的是，“文化大革命”后的《光明日报》迅速实现了拨乱反正，并在随后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率先刊发了《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我们也为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有那么一段特殊的工作经历而感到自豪。

□ 《百年潮》2010年第9期

~~~~~

## 【史实探讨】

### 关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几个问题

• 卜伟华 •

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这本书，我只是匆匆看过，没有来得及仔细研究。总的感觉是：两个外国人，能把中国文革史写到这个程度，真是难能可贵。我对两位作者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我在阅读的过程中，记下了一些问题，在这里提出来，供作者参考。

#### “保护吴晗的文章”

第29页：“北京市委的高级干部们匿名撰写了一批保护吴晗的文章”。

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看了这段话，会以为真的有人逆流而动，勇敢地站出来为吴晗辩护。严格说来，这些文章不能简单地说是保护吴晗的文章，其实还是一些批判吴晗的文章，只不过语气稍为缓和，较为讲道理。最主要的有两篇文章，一是邓拓化名向阳生写的《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一是李琪化名李东石写的《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在戚本禹、姚文元等左派看来，他们是在“假批判，真包庇”，而从这些作者来说，可能确实是想以这种方式间接地对吴晗进行一点儿有限的“保护”。但从文本上看，还是以极左的理论观点对吴晗进行批判，批判的方法也同样是“扣帽子”、“打棍子”。例如，在向阳生的文章中，批评吴晗“尽力宣扬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等一整套封建的道德”。说吴晗的“道德观本质上是属于资本主义甚至是封建主义的范畴，他的历史观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他的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等等。

荒诞不经的东西也可以写入书稿吗？

第36页：“一位喝醉了酒的公安特情人员在同笔者之一交谈时，坚持说他看过一位当时在场的解放军元帅的私人日记，原文的结尾是‘主席可以为叶群是处女作证’！”

1966年5月19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散发了林彪写的所谓“处女证明”之事，已有几个在场的当事人作过回忆，基本可以认为确有其事，但在当事人的回忆中具体文字略有出入。要彻底弄清真相，恐怕只有等待将来公布档案之日了。

而所谓的元帅日记的说法，我认为是荒诞不经的。说毛泽东“可以为叶群是处女作证”，无异于说毛泽东让林彪戴了绿帽子，这玩笑开得有点儿大。对毛泽东的私人生活历来传闻颇多，但很少有让人信服的证据出现。

我并不怀疑作者有过这样的交谈，但能把如此荒诞不经的东西写入书稿，令我吃惊。

杨尚昆下台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第38页：说杨尚昆下台的“真正的原因是毛希望让自己信得过的人来控制颁发中央文件”。

这个认识可能过于简单了。用杨尚昆自己的话来说：“毛泽东认为我是教条主义者，又和彭

德怀关系密切，如果不撤掉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我将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所以，他首先拿我开刀。”（据苏维民《杨尚昆忆为何被撤中办主任：毛泽东首先拿我开刀》）

我认为，让杨下台，不仅是因为他和彭德怀关系密切，主要还是因为他与刘邓走得太近了。刘邓主持日常工作，作为中办主任的杨尚昆自然要与他们频繁接触，这就为毛所不容了。周恩来的一段话（1966年5月21日）可以参考：“杨不能与那三个人相比，他自己成不了气候，只是抱了腿。彭、罗、陆都是得到中央信任，各把一方。”周恩来的话一语中的，击中了要害。杨尚昆下台的真正原因就是毛泽东认为杨“抱了腿”。

“针对四大家族的批斗会”和“庆祝四个人下台的集会”

第43页：“6月，中南海举行了针对‘四大家族’的批斗会，这也是文革中无休无止的群众集会的开头。与此同时，北京到处召开有组织的群众集会，庆祝那4人的下台，宣誓对中央效忠。”

1966年6月，北京的群众集会确实很多，但书中所说的中南海内“针对‘四大家族’的批斗会”和“庆祝那4人的下台”的群众集会，却是想当然耳。

彭、罗、陆、杨下台的消息在当时还是保密的，许多老百姓还不知道这回事。他们的名字直到1967年5月以后才见诸报端。

根据现已公开出版的四个人的传记，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各自最早被批斗的时间。

罗瑞卿在1966年3月的京西宾馆会议上受到批判，但那是军队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以及公安系统的42名负责干部出席的会议，与有群众参加的批斗会不是一回事。罗瑞卿第一次公开接受批斗是在1966年12月24日，当天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批判罗瑞卿篡党反革命集团大会，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与萧向荣、梁必业、王尚荣、陈鹤桥、史进前等人陪斗。

彭真第一次被公开批斗，是在1966年12月12日。当天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由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等高校造反派串连各院校和北京市直属单位共12万人参加的“首都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会上批斗了彭真、刘仁、万里、郑天翔、吴晗等人。

陆定一第一次接受公开批斗的时间，是1966年12月9日。

杨尚昆1966年6月根本就没在北京。他原被贬到广东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又被改任为肇庆地委书记。因身体不适应广东的潮湿酷热，杨尚昆向邓小平和周恩来“恳切要求”调换到北方工作。1966年5月30日，杨尚昆被从广州调往山西临汾任地委书记。7月3日，杨尚昆被“监护审查”。12月25日，中央专案组派专机把他押回北京，从此才开始接受无休止的批斗。

中央文件中没有说“停课”

第61页：“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决定，在全国大学和中小学‘暂时’停课”。

6月1日以后，确实有许多学校都逐渐停课了，但要说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决定让大中小学停课，则不准确。该文件中并没有“停课”的说法。

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通知认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考虑到上述情况，决定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一方面，使高等学校和高中有足够的时间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另一方面使实行新的招生办法有充分的时间作好一切准备。”

哪儿来的第14卷？

第65页注62与注63，都是引自《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4卷。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一共只有9卷，另加4个附卷，总计有13卷，哪儿来的第14卷呢？原来是作者把册数当成了卷数。有的卷不只一册，该套书在书脊上标有连续排列下来的册数，共19册。书中所引材料正确的标注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九卷（第14册）。

张冠李戴

第68页，引用清华工作组组长叶林的话说，当时他完全没有做好准备接受（工作组）这个工作。

但注释却说来自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的文章《“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大工作组》。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

清华北大谁排第一？

第69页：“清华大学在北京排名第一，6月份一共涌现出了65000张大字报”。

这个说法肯定不准确。当时北大的大字报可能要比清华多很多。张承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大工作组》一文中说，仅6月1日至6日，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北大即有50000张大字报。至于北大6月份一共出了多少大字报的数字手头没有，但肯定要比65000张多得多。我当时所在的清华附中，6月份的大字报达到了20000张（据清华附中工作组1966年7月4日汇报材料），附中师生不过一千四五百人，而清华当时在校学生即有16000多人。按比例来说，清华大学的大字报还不如附中多呢。

“黑帮”帽子何曾“不用了”？

第69页：“（黑帮）这顶帽子在6、7月间的媒体上满天飞，由于据说它对如此之类的戴帽人‘不能说明其性质’，8月份以后就悄然不用了”。

这样写的根据是《周恩来年谱》中说：“在讨论十六条的过程中，周恩来与陶铸商量后，删掉了原稿中‘黑帮’、‘黑线’一类用词”。但《十六条》中删掉了这类词语并不影响这类词语在群众中，在社会上继续大量使用。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黑帮”、“黑线”这类用词实际上是贯穿文革始终的。不仅群众中用，《人民日报》上也一直在用，尤其是在说到邓拓、彭真等名字时常常会用“黑帮”这个词，这只需翻看一下当年的报纸就知道了。1969年以后，“黑帮”一词基本不用了，但“黑线”一词还在继续使用。有意思的是，1976年10月以后，《人民日报》又开始使用“黑帮”一词了，不过这回是用在了江青等人的头上了。

是173人还是195人？

第88页：“在1956年和1958年的中共‘八大’两次会议上选举的173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只有141人参加了会议，和正常情况相比，人数大大减少，这说明许多领



领导人找借口脱身，避开这注定的是非之地。”

当时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总数不是173人，而是195人。（八大选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70人，八大二次会议增补25人为候补中央委员，合计总数为195人）说出席人数少是“许多领导人找借口脱身，避开这注定的是非之地”，很不靠谱。有许多人是想参加也参加不了的，如此前被打倒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习仲勋、贾拓夫、谭政、万毅、王稼祥、李立三、肖克、邓华、杨献珍、周扬、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刘仁、乌兰夫、奎璧、林铁等人被剥夺了出席全会的权利（人数不全，还须核实）。另外，自八大以来逝世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共11人：黄敬、赖若愚、林伯渠、罗荣桓、柯庆施、陈赓、李克农、刘亚楼、甘泗淇、周保中、张德生。说列席全会的47人中有两位“革命师生”，也不对。列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革命师生”除聂元梓和杨克明外，还有：北京大学学生高盛清和原北京大学教师张恩慈，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谭厚兰，清华大学学生王博文、贺鹏飞、花春荣，北京广播学院学生邓良宝，北京邮电学院学生王柏松，北京工业大学教师陆彩云，北京戏剧学院教师梁恩泽，北京第四中学学生孔丹等人。

能这样加注吗？

第105页：“在文革后期，（毛）在与其亲信们谈话时，主席甚至提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标志确切地说是他为了革命而心甘情愿地承受大肆杀戮的死人数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位希特勒更凶。越凶越好，你信不信？越杀人就越要革命。’”注释为：本书作者看到的一个可靠的材料。

毛泽东为达目的死多少人都怕这样的话，我们都见过。但问题是：我们在写书时，难道可以这样来加注吗？这样加注还有什么意义呢？

8月13日大会

第106页：“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大约7万名青年男女见证了对10余名小‘流氓’的公开批斗”。“这些流氓遭到了殴打。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负责监督北京文革的进程，他也不能或不愿意进行干预”。

1966年8月13日北京工人体育场斗争大会批斗的“小流氓”不是“十余名”，而是5名。说王任重“也不能或不愿意进行干预”现场的殴打，这话说反了，王任重是想努力控制局面，制止打人现象的蔓延的。而毛泽东是主张放任自流的，所以，毛泽东批评了这个大会和支持中学生开会的王任重。这个大会上，打人者是突然从观众席上冲向体育场中的，他在打人时还得到了全场的许多掌声。这个场面在北京市造成了恶劣影响，周恩来后来也严厉批评过这次大会。大会的本意是想控制局面，维护秩序，实际效果却是助长了打人风气的形成。但不容否认的是，大会的组织者中有人出面制止了打人。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第一个打人者的行动得到了掌声的时候——我当时就在观众席上——又有许多人开始离开座位冲向体育场内了。可以肯定，如果不加制止的话，那肯定是要出人命的。

中学何时开展运动？

第106页：“彭真的故事表明，最恐怖的罪行发生在中学甚至小学里，而不是北大或其它高校”。在注释中说：“在大多数中共领导人看来，假如让曹轶欧去一所中学煽动人们支持毛，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他们或许会认为毛已经失去了理智。实际上各大高校从5月中旬开始进行动员，到8月初毛才批准在中学开展运动。”

注释中的话是有问题的。从北京的情况看来，高校和中学几乎是同时开展运动的。1966年4月17日，高教部党委召开了北京天津10所高校党委书记、宣传部长会议，讨论和部

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问题。4月19日，中央办公厅教育办公室编发了关于高教部党委召开座谈会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情况简报，这份简报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好评。毛泽东于4月23日批示：此件好，发各位同志看。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这也就是说，毛泽东在4月份就“批准在中学开展运动”了。另外，在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于5月10日在全校大会上作了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这个报告后来受到清华附中一些学生的批评。

和大学生相比，中学生思想单纯，更容易冲动，盲目性更大。但要说“最无条件积极支持文革的是中国的1300万中学生”，还是不妥。因为这1300万中学生里，还是可以分成各种各样的人，对文革的态度还是会有千差万别的。

#### 编造的材料不能用

第107页，引用了于辉的《红卫兵秘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中有关红卫兵成立的段落。

用文学笔法描述红卫兵成立的具体情形，有一点儿可读性，但不能作为研究历史的依据。作为一部比较严肃的历史著作，在引用的材料上本应更讲究一点儿的。

本书引用的段落中说：“次日，一批用‘红卫兵’的名义写出的大字报就覆盖了北京西郊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第一张大字报并不是在（5月29日的）次日，而是4天以后的6月2日贴出的，没有“一批”，只有1张。

#### 对工作组的作用应作全面的分析

第127页：“在‘五十天’内，尤其是在工作组煽动学生而不是阻止学生的时候，在北京和各省市区，羞辱折磨的例子无计其数，有些还出了人命。”

工作组时期，整了不少人，也有死人的现象，但总的说来，工作组还是维持秩序，反对乱打乱斗的。有工作组在，还能维持起码的正常秩序，工作组一撤，秩序大乱，目无法纪的“破四旧”和大批打死人的现象都出现了。对工作组的历史作用也应该作比较全面的分析。

#### 一段翻译错误

第127页：“在上海，9月份与文革相关的有704人自杀，534人被杀害”。

这段话容易被理解为：除了有704人自杀外，还有534人被杀害。其实，这是个翻译错误（其中还包括引用数字错误）。裴、李书中原文为：

In the month of September 1966 Shanghai suffered 704 suicides and 354 deaths connected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应该翻译为：1966年9月，上海有704人自杀，354（不是534）人死亡。也就是说，在704个自杀者中大约有一半人死亡。

这个材料引自裴宜理、李逊的《无产阶级的力量》一书。经向李逊请教，这个数字的原始出处是上海市委办公厅编的《文化大革命动态》第841期。“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1994年编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这本后来并没有正式出版的书中披露了这条史料。

夸张的说法

第130页，在提到北京一〇一中的时候说：“这所学校的学生家长几乎全部是中共‘五大部’的工作人员”。

北京一〇一中建校于1946年，曾经使用过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华北育才中学等校名，是中国共产党在老区创办并迁入北京的唯一一所中学。该校干部子弟较多，但要说“几乎全部是中共‘五大部’的工作人员”则太夸张了。据我向当时在校的一〇一中校友了解，绝对没有那么多，干部子弟相对较多的班能占50%左右，有些班，如高一的几个班，每班干部子弟也就十几个人。清华附中也算干部子弟较多的，但干部子弟所占的比重，也常被人夸大了。例如我所在的初634班，全班先后共有53人（有4人留级），干部子弟有12人。

似是而非

第133页，在叙述了大兴屠杀事件后，引用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话：“我们到大兴县去调查……形势非常好”。

如此写法，容易造成这样的印象：王力对屠杀五类分子的行为是肯定的，而且还说“形势非常好”。其实，王力的原话是：“我们到大兴县去调查，只有一个大队没有动起来，他们分成两派，一派保、一派造反，形势非常好，坏人要组织武斗就让他们暴露，不要怕，这样大的斗争，不可能那样顺利，我们每个同志必须站在毛主席这一边，必须旗帜鲜明。”王力说的是对保守和造反的问题上要旗帜鲜明，这里面并没有包含对大兴屠杀事件的肯定态度。

临时工、合同工与正式工

第165页：“上海市委在此事件中遭受了惨败，但是没有出局。‘《解放日报》事件’表明，它仍然有能力动员大批市民来保卫自己。而上海市委的死敌‘工总司’却吸引了大批的临时工和合同工。与此同时，上海的正式工，总的来说，受益于现有的领导层，故而是支持现状的。他们自己组成了赤卫队，与‘工总司’抗衡”。

将上海工人中造反与保守的对立说成是临时工、合同工与正式工的对立，可能过于简单化了，而且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临时工、合同工中的保守派和正式工中的造反派同样大量存在。上海最著名的工人造反派，如王洪文、王秀珍、陈阿大、潘国平、耿金章等都是正式工。说工总司吸引了大批的临时工和合同工也不准确，当时上海另有一个主要由临时工、外包工组成的群众造反组织“红工司”（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后被工总司和上海市革委会镇压。

“联动”

第199页：“（“联合行动委员会”）“这个红卫兵组织完全是由高干子女组成的，他们之所以走到一起，是因为他们突然认识到，文革针对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嫌疑目标，而是他们自己的父母。”

“联动”，全称是“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它是老红卫兵组织的一个松散联盟，并无严密的组织机构。就像不能说老红卫兵完全是由高干子女组成的一样，也不能说“联动”完全是由高干子女组成的。一般来说，老红卫兵组织都是由高干子女、普通干部子女、非红五类子女等几部分组成的，具体到不同的学校，各种出身所占比例会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所学校的老红卫兵组织都不可能是完全由高干子女组成的。

广大干部受到冲击，他们的子女自然会有反应。由不相信自己的父母会是什么走资派，到怀疑普遍地炮打司令部的合理性，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联动”产生的真正原因，实际上还

是从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的。老红卫兵（包括大多数的保守派）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基本上来自“十六条”中的那些原则：破四旧立四新，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干部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等。1966年10月以后，运动的主流迅速从破四旧转到炮打司令部，老红卫兵和保守派转不过这个弯子来，最终被运动所抛弃，其中一些极端分子走上了怀疑、反对中央文革的道路。

王任重派北京红卫兵去保卫湖北省委？

第203页：“王（任重）利用这个重要的职位向（湖北）省内的下属通报信，让他们避开文革的漩涡”。在注释中说：“比如，1966年8月末，湖北省和武汉市委受到了北京红卫兵的攻击，王任重从首都派了一支敌对的红卫兵去保卫它们。”

1966年8月底，王任重向师大女附中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建议，让他们去武汉看看，介绍一下北京的经验。王任重虽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但显然还不具备调遣北京红卫兵为他服务的权威。

9月6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等5人发表了《致革命同学的公开信》，信中说：“现在在北京南下串连的同学中有一部分人要打倒湖北省委，说湖北省委是黑帮黑线，张体学同志（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是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这些反动的观点我们坚决反对！”公开信中的这些观点与当时武汉市的绝大多数群众是一致的。（最近宋彬彬已经说明《公开信》发表的不是他们的原稿，是被湖北省委做了很大的改动的，详见《记忆》总第47期。）

清华附中红卫兵则认为，湖北省委的领导人对于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9月1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以“中南支队”的名义，发表了“访汉声明”。首先指出了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偏差：“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存在着严重的偏差，广大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积极主动地炮轰省委，向省委的错误、缺点开火，而是集中很多精力攻击外地来汉的所谓一小撮混蛋，敌对情绪很大。”其次指出了省委的错误，认为湖北省委存在着压制批评和扩大敌对情绪的错误。针对武汉市当时流行的口号“揪南下一小撮”，声明提出，外地来汉师生的主流是好的，然后又说，在炮打司令部的群众运动中，乘机捣乱，乘机进行阶级报复的混蛋是有的。最后提出了希望：“我们诚恳地希望湖北省委负责同志担起责任来，接受批评，检讨错误，纠正错误，正像十六条所说的那样：‘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希望省委深刻认真理解当前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特别是炮打司令部的群众运动，敢字当头，谦虚谨慎加以得力领导，使运动走上正确的轨道，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举出当年的这些文字，目的是想说明：对任何历史事件的叙述切忌概念化、简单化，应该以史料说话。

“百万雄师”否认有必要开展文革？

第206页：“实际上，‘百万雄师’否认有必要开展文革，至少在湖北不需要”。

实际上，当时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否定文革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对他们来说，不是要不要文革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文革的问题。“百万雄师”和类似的保守派只是按照他们理解的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去参与运动。他们以共产党传统的做法和政策来衡量所发生的一切，殊不知毛泽东自己先一反常态，采用了一整套超常规的做法。保守派用过去的毛泽东思想来反对现在的毛泽东思想，成为了逆潮流而动的力量。

难以置信

第207页，引用武汉一个17岁的中学生自述：杀一个小孩可以得20元，杀一个成人可以得50元，所有杀死了人的钱到红卫兵头头那领。这个材料来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编：《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这类材料往往会有大量的夸张、虚假的成分，引用须谨慎。无论如何，这种事情都是难以置信的。而对难以置信的材料，应该尽量搜寻可与之相印证的其他材料。在没有任何其他材料支持的情况下，一般不宜贸然使用。郭沫若所说“孤证单行，难以置信”（史学论集·论古代社会），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

莫名其妙

第225页：“随着在几天的联合搜捕行动中把‘五一六’兵团‘打倒’，中央当局就不再对这一兵团感兴趣了。注释说，引自卜伟华《北京红卫兵运动大事记》。

这有些莫名其妙，不知道作者是如何从我的那篇文章中得出了“当局不再对这一兵团感兴趣”的结论的？其实，在1967年8月基本摧毁了真正存在过的“五一六”兵团后，1968年、1969年，当局一直都在讲“五一六”的问题。到1970年、1971年更是大张旗鼓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了。

书中所说“李震死后不久，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行动就鸣金收兵了”（第242页），也不准确。李震死于1973年10月21日，此后，清查“五·一六”的运动既未“鸣金”，也未“收兵”。全国许多地方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既没有宣布结束，也没有结果，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戴像章是特权吗？

第267页：“在文革开始时，只有少数阶级背景好的人享受到佩带毛的像章”。

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文革初期佩戴像章是非常普通的事情，并非只是少数人的专享。在“血统论”盛行的时候，出现过禁止“五类分子”及其子女佩戴像章的事情，但总的说来，还是属于个别现象，不能用个别代替一般。“破四旧”时，北京还出现过禁止“五类分子”及其子女抽烟喝酒的事情（见北京一〇一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井冈山之火战斗队”：《勒令》），但不能因此就说：在文革开始时，只有少数阶级背景好的人能够享受烟酒。

语意不清

第443页：“‘四人帮’的战术和他们的战略一样错误。作为毛身边拥有重权的宠臣，他们在北京呆了19年，亲手制造了文革的混乱，自己也变得狂妄傲慢，自以为是。”

这段话语意不清。“四人帮”这个词是1974年才出现的，1976年时“四人帮”才两岁，怎么能“在北京呆了19年”？王、张、姚长期生活在上海，江1949年到北京，1976年时已在北京“呆了”27年了。

□ 原载《记忆》第五十八期 2010年9月30日 另见“卜伟华博客”

~~~~~

【人物春秋】

江青的亲情世界（上）

• 杨银禄 •

◇ 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失败的选择吗

2007年7月，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爱恨交加失败选择。”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1938年11月20日，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结婚。毛泽东的选择是正确的，还是失败的，请看以下事实：

在进步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下，江青于1933年2月，在青岛市由地下党员、时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黄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黄敬因叛徒出卖被捕，江青随即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于是，她奔赴上海寻找党的组织。到上海后，她以演话剧、演电影、教学、写文章等形式，为提高妇女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从总的方面讲，这一时期江青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

1937年7月，江青已经是明星了，但她仍然从生活安逸的大上海，来到条件十分艰苦且很不安定、很不安全的延安。这一行动，不具备一定的政治思想觉悟，是很难做到的。这进一步表现了她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当时，江青走的道路，也是许多革命和进步的青年共同走过的正确道路。

江青在延安的10年，作风谦虚谨慎，生活艰苦朴素，表现也是好的。她还到南泥湾参加过劳动，同8位女同志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个硬炕。

美国作家特里尔所著的《江青全传》中说：“在毛泽东与西方来访者交谈时，江青几乎从不发话……江青看上去非常漂亮，是一个年轻温柔的女人……江青照顾毛泽东的身体、日常工作、洗衣做饭，帮助买东西，打扫房间。她不喜欢吃辛辣的食物，但毛泽东喜欢，所以毛家的每一顿饭都有辣味菜。她很直率，也很谦虚，从各方面看，她的感情很丰富，是一位贤惠的妻子，温柔的母亲。”

2005年春天，我参加一个活动，见到了在延安时任中央警卫团手枪连连长的高富有老前辈。我问他江青在延安时的表现如何，高老说：“那个时候，江青的表现很不错，对毛主席的生活很关心，对主席的吃喝拉撒睡安排得很细致、很周到，真正尽到了一个做妻子的责任。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等中央领导转战陕北时，别的中央领导的妻子都过了黄河，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只有江青留在陕北，跟着毛主席与数倍于我军的敌军周旋，为了毛主席的生活跑前跑后，很不容易。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她一直表现比较好，‘文革’开始以后，她才起了一些变化。”

在我看来，江青对毛主席一直都很崇拜、尊重并充满感情。她给毛主席写信、谈话或在会议上发言，从来不称呼“毛泽东”或“润之”，总是称呼“主席主席”的。她经常说：“我是主席的学生、哨兵。”“文革”期间，每年的12月26日（毛主席的生日），她从未忘记。那天精神也特别好，非常兴奋，主动邀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同她一起吃长寿面，并对大家说：“咱们一起祝主席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叶永烈在《江青画传》一书中写道：“9月8日子夜，毛泽东气息微弱。当9月9日零时刚过，才10分钟，毛泽东停止了呼吸。张玉凤奔出主席卧室，疾步走向毛主席书房，向守候在那里的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报告噩耗。不过一箭之遥的江青，得到报告，马上奔

了过来。后来，姚文元曾经这样描述他在现场的所见：“她头发散乱，神情慌张，进门便扑在主席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呵！你们为什么不救救他呀！’她嗓子都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姚文元所述应该是真实的。不管怎么说，江青跟毛泽东从1938年结合，到1976年毕竟有着38年的夫妻感情。”我认为，叶永烈的话说得很到位。

据我所知，江青被捕后，在身体日趋虚弱的时候更常常想起主席。她身边放着主席的手迹，衣服上别着主席的像章，床上放着一张与毛主席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背诵主席的诗词，或阅读《毛泽东选集》。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要求到毛主席纪念堂，给主席送一个花圈。

江青有以上这些表现，主席选择她为妻，怎么能说是失败的选择呢？我认为不是。

◇ 毛和江感情的微妙变化

1969年下半年的一天，江青叫我给毛主席亲自送一封信。主席见到我跟我聊天时说：“小杨，我还是那句话，你们在江青那里工作很辛苦，谢谢同志们。她的身体不太好，你们要帮帮她。”我说：“谢谢主席的鼓励，请主席放心，为江青同志服务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会努力工作的。”毛主席说：“我放心，你们都是好同志。”

1974年4月17日，毛主席给江青回了两封信，信中分别说：

“江青：两信收。前后不一。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面（面）。千万要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

“江青：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杨柳。后封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不宜请长假。”

从这两封信可以看出，毛主席对江青仍然是关怀的。在江青有失落感之后，还教诲她：“风物长宜（放）眼量”、“无限风光在险峰”，而且情见乎词，不大似一棍子打死。

从1967年开始到1969年上半年，为了给毛主席留下勤奋好学、阅读广泛、理解深刻、政治敏锐、尊敬领袖的好印象，江青给毛主席选送过大量参阅材料。

江青选送的材料种类有：报纸，如《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解放军报》、《文汇报》等；刊物，如《参考资料》（大参考）、《红旗》、《新情况》等；材料有《内部参考清样》，各地记者站了解到的情况反映，如文革小组记者站的《快报》、《文化革命简报》、《要事汇报》等了解到的重要情报，中央召开的会议重要简报等。

选送的内容大部分是：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各单位、国家机关以及世界上各兄弟党对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评论（好的评论）、执行的情况；对中央文革、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决定的表态和执行情况（表态正确的，执行坚决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国内、国际上的突发事件等。

呈送的方法是：江青认为某某报刊上的某篇文章、消息、情况等很重要，值得呈送毛主席参阅的，她就用红铅笔在那篇文章、消息、情况题目的左边画一个大圈圈，在大圈圈内画一个

小圈，或者画一个大三角，以表示要参阅的就是这一篇，再在左眉处写上“请主席参阅”或“请主席阅”的字样，落款是“江青”。最后注明年月日，有时还注明几时。装入信封前，把要呈送的文章、消息、情况翻折到明面上，使主席一打开信封，抽出材料，就知道是哪一篇，不用到处翻找，以示对主席的尊重。

信封是这样写的：右边写“即送”二字，中间写“主席亲启”四个字，左边写“江青”二字，在信封的左上角写“急”或“特急”（有时还注有“绝密”二字）。在“急”、“特急”、“绝密”的右边画几个圈，以引起重视。毛主席看完以后，在他的名字上用黑铅笔或红铅笔、蓝铅笔画一个大大的、圆圆的圈，有时还写上“已阅”两个字。在信封上他的名字上再画一个大圆圈，在江青的名字上方写上“退”字。有时，江青认为内容特别重要，就在信封上写“请杨英路同志（作者注——江青给我改的名字）面呈主席亲启，江青托”，并在“亲启”二字的右边画上两个圈，用以引起秘书的重视，秘书不能擅自拆开信封。

在党的“九大”以前，毛主席对江青选送他的材料都很重视，篇篇都看，篇篇都画圈。不知为什么“九大”以后看得就少了，退给江青时，有的画圈，有的不画。1969年七八月份之后，就基本上不画圈了，有时甚至连信封都不拆，原封退了回来。江青自讨没趣，也就不再选送了。

1969年10月，为了防范苏联利用谈判之机对我国进行军事袭击，全国搞战备动员。10月14日，中共中央通知紧急疏散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江青也搬到北京的西山躲避战火。

有一天，江青对我说：“小杨，在我睡觉的时候，你回钓鱼台一趟，把我给主席选送的参阅件统统拿到这里来。”我问道：“主席画圈的或没画圈的都拿来吗？”她说：“对，都拿来，一件都不能少。你不要问为什么，叫你去拿就去拿，越快越好。”当天晚上，我利用她睡觉的时候把她要的材料从钓鱼台10号楼拿到了西山，装了足足两个纸箱，叠在一起有一米高。第二天，她到办公室办公的时候，我去报告她说：“江青同志，你叫我拿的材料，我拿回来了，你看放在哪儿？”她说：“就放在你的办公室里，你要保存好，不能丢失。你今天就在咱们这个大院里选一个避风的地方垒个大炉子，我要亲自销毁这些材料，要打仗了，以防落到敌人手里。这件事儿你马上去办，垒好以后，我还亲自去检查。”她手一挥，说：“你去吧。”

从江青的办公室出来，我打电话找到了那里的管理科科长，请他帮忙垒炉子。他答应得很痛快，马上组织人力，搬运物料，只用了两个多小时，就在庭院北头的西墙根垒了一个炉子，还用粗铁管安装了一个烟囱。垒好后，我去报告正在吃午饭的江青。她听了以后，说：“我知道了，你去吧。”因为进餐厅以前，已经服过安眠药，她不愿意多说话，怕精神了不能入睡，所以，我报告她的时候，眼皮都没有抬一下。我当然也没敢多说话，就退了出来。

江青心里有事要办，所以此日午觉睡得时间不长。起床以后就打铃向我要那些材料，说她要亲自监督我把那些材料销毁掉。我说：“要不要把主席画了圈、写了字的材料留下来继续保存？烧掉太可惜了。”她瞪了我一眼，不高兴地说：“留下来，你想干什么？不留，全部销毁！”我说：“不留，不留，全部销毁。”她还小声叨叨：“这是我和主席的东西，我有权力处理，别人无权过问。”我装上柴火，放上材料就走到了炉子旁边。江青说：“不错嘛，这炉子修得比较好，比钓鱼台那个修得好，点火吧。”我先把几页散纸塞进去点着，再把大厚本的《大参考》、《红旗》等撕开，扔进去，用事先准备好的木棍把纸挑起来，这样烧得快些。一开始，江青离炉子很近，为的是认真监督我，怕我私藏几份。当炉火烧大了，熊熊的火焰烤得周围热呼呼的，她就躲开了，只是远远地张望。材料烧完、烧尽后，我过去报告她：“江青同志，销毁完了，请你检查。”她走过去，拿起木棍，挑了几下，放下木棍，说：“好，我又办了一件大事。”她一边往回走，

一边说：“要不是搞战备，要打仗了，我才不销毁这些材料呢！这些东西说明我为主席和文化大革命所做的工作，主席对此不只一次地肯定过。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下半年以来，主席不愿意看我送给他的材料了，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了。”

◇ 毛主席送江青五个玉米

2009年6月，我看到《湘潮》上曹英的一篇文章《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前的关键决策》，该文披露：“姚文元在1970年9月15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毛泽东在8月15日中秋节。毛主席送给江青五个玉米，而且指定是五个，江青同志送张春桥和我各一，我在吃晚餐时吃了。一面嚼着清甜而韧的玉米粒子，一面凝神细思主席的用意所在，觉其味无穷。”

这一情节勾起我的一段回忆：中秋节那天晚上，江青从外边带回了两个玉米，她说：“主席给了我五个玉米，我给了康老、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个，这两个给我留半个，另外的给你们工作人员吃了吧。”这样，我也吃了一小截。毛主席送给江青的五个玉米是黏性的。当时，我对主席送给江青的玉米为什么不多不少正好是五个没敢多想。

但是我知道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尤其是“九一三”事件以后，毛主席不太想见江青了。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江青到中南海去看毛主席还比较方便，只要毛主席不是在睡觉，不是在接见外宾，不是在参加常委会，她想说的话，只要打一个电话说去就去了。有时看了毛主席以后，她还在丰泽园（毛泽东住所）住上一个晚上，她说这是回家。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她再想去看毛主席，就更不方便了。

有一天，汪东兴给我来电话，他说：“杨银禄同志，主席叫我通知江青同志，说他年纪大了，需要安静。如果江青要来看望主席或请示汇报什么，必须经主席同意才能来，如果未经同意，来了也不见。请你先向江青同志转达主席的指示，江青同志有什么意见，我再跟她解释，这样做，有回旋的余地。”

我知道，给江青传达这样的指示是很困难的，但是汪东兴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又是我的直接领导，我得听他的。明知此事汇报给江青以后，她会不高兴，甚至会发脾气，我也得硬着头皮报告她。不出所料，她果然大发脾气：“我去看主席，我的丈夫，还受限制？这是主席的指示，还是你们汪主任的意见？”我说：“汪主任说了，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她说：“是你们汪主任出的主意吧？我得亲自去问问他，我不相信主席会有这样的指示！”

1999年3月21日，我们7位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过的同志，去看望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吴阶平同志，其中有康生的秘书黄宗汉。那天他悄悄地把我叫到一旁，问我：“老杨，有件事我问问你好吗？”

我说：“你问吧，没关系。”

他说：“1970年9月中旬，也就是旧历8月中旬的一天，毛主席送给江青五个玉米，你还记得吗？”

我说：“记得，我还想问问你呢，你说说那件事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康生对于这件事，跟我说过：‘那五个玉米主席肯定指的是军委办事组的那五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玉’寓指‘欲’，意思就是说，庐山会议上的问题还没有完，预示着还有更大的斗争，山雨欲来风满楼嘛。‘米’寓指‘迷’，意思是提醒江青在斗争中不要迷失方向，头脑要清醒，不要迷迷糊糊，以此可以看出来主席对江青的看法有所变化，我的这种分析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更不要向江青透露，江青这个人很聪明，也很敏感，她会领悟到主席送给她五个玉米的含义的。’”

黄宗汉说完，我没说什么，因为我对康生的解读将信将疑。

粉碎“四人帮”以后，汪东兴回忆说：“有一天江青几次打电话要见主席，主席坚决不同意。可是，江青硬是闯到了主席住地中南海游泳池。江青对哨兵说：‘不要通知，我不去主席那里，我要到里面看看卫生，就出来。’年轻的哨兵被欺骗了，江青在室外游泳池转了一圈后，就从室内游泳池北门进去了。她见到张耀祠就训斥道：‘你老糊涂了，为什么不尊重我！哨兵为什么不让我进？’她头也不回地进了主席的卧室。主席见到她就发火了，立即把我叫去，狠狠地批评道：‘为什么不把江青挡住？她和其他人一样，没有我的同意不能来。’主席批评后，我马上找了张耀祠、陈长江等人开会，我对他们说，遵照主席的指示，任何人不经主席同意都不能进来，江青也一样。要给哨兵下死命令，当作政治任务来做，保证主席的安静和安全。如果没有经主席同意，江青执意要来的话，在宝光门检查站就开始挡驾，不让她往北来，执行主席的指示一定要坚决，不能有丝毫的犹豫。”

◇ “为什么不让我去见主席？”

有一天，江青坐着大红旗轿车，高高兴兴地进了中南海，准备去见毛主席。到了宝光门，她叫司机向左拐，说是去见主席。警卫战士非常果断地伸手将红旗轿车挡住。

因为大红旗车是后排座位，车身很长，所以坐在后排座位上的江青没有看到哨兵伸手挡车。车停下后，江青问司机：“你怎么不走了？”司机说：“哨兵不让过。”江青听了以后，气呼呼地从车上下来，质问警卫战士：“为什么挡我的车？我是江青，我要去看主席，躲开！”

这时，一位干部立即从检查站室内走出来，恭恭敬敬向江青行了个军礼，解释道：“报告江青同志，对不起，你现在不能到主席那里去。”

江青又质问：“为什么不让我去见主席？这是谁的命令？谁敢挡我？”

这位干部回答：“这是上级的命令。”

江青进一步质问：“你的上级是谁？我去找他，岂有此理！”

这位干部和气地说：“我的上级是我们部队的领导，他们工作很忙，不好找。”

江青说：“那好吧，我的汽车就停在这里，我步行去主席那里，行不行？”

这位干部坚持原则，执行上级的命令坚决，他说：“那也不行，你现在不能到主席那里去，请你原谅。”

江青气得两手发抖，满头冒汗，霍地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棍，举手就要打这位干部。这位干部不火不急，又向她行了个军礼，不慌不忙地说：“报告首长，请你不要打人，打人是错误的！”

江青双眼圆瞪，两腮抖动，大声说：“我打了你又怎么样？你敢还手？！”

这位干部说：“我们的上级教导我们，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请首长息怒！”

江青无奈，只好钻进汽车往右拐到她住的地方去。

她知道没有毛主席发话，谁敢阻挡她呀！回到钓鱼台以后，她还不服气地打电话跟汪东兴吵了一架。

事后，汪东兴把警卫战士挡驾江青的事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以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态度很释然，连连点头说：“那好哇，挡得好哇。以后没有我的批准，还是不让她来我这里，不然我就不得安宁了。”

汪东兴为难地说：“好是好哇，我就怕她对我说三道四，不好办。”

毛主席说：“你怕什么？不许她来是我下的命令，如果她找你的麻烦，有我顶着！”

为了见到毛主席，江青想了不少办法。她以锻炼身体为名，要求到主席住地中南海游泳池去游泳，这样她就可以趁机会很方便地见到主席。

第一次请示主席没有回音；第二次请示，还是没有回话；过了两天再次请示时，主席终于发话了，他生气地说：“江青这个人不理解人，也不体贴人。人老了，想安静些，她就是不让我安宁。江青要来，我就走。”

到了第四天，江青再次请示主席时，游泳池警卫值班室的工作人员说：“主席到外地去了。”

我把毛主席去外地的消息报告江青以后，她非常生气地说：“怎么，主席到外地这样重要的情况，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还对我进行封锁？”

她沉思了片刻，又说：“我的身体不好，他是知道的，我想游游泳无非是想锻炼一下身体，调整一下情绪，松弛一下神经，没什么别的意思。可是，请示几次他也不回话，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原来他是想躲开我呀，既然不欢迎我，我也就不去了，何苦搞没趣儿。”

这是我第一次发现江青对主席发泄不满情绪。

江青怕牢骚话传到主席那里去，挨批评，又解释说：“我和主席共同生活了多年，我是最了解主席的性情的，他这是爱护我，怕游泳累着我，况且主席年岁大了，他想安静一些。虽然我是主席的妻子，可是这几年，想见主席一面是多么地不容易啊！你们不理解吧，这才叫政治夫妻呐。”

◇ 江青的姐姐李云露

江青有一个同父异母的亲姐姐居住在北京，“文革”期间经济收入很少，生活相当困难，江青对她在生活上没有任何帮助和照顾，就像没有这么个姐姐一样。

党的九大以后，我发现一个叫李云露的人经常给江青写信，内容一是说想念江青，想见江青一面，想念李讷；二是了解江青的身体情况，请她保重身体；三是告诉江青她的生活比较艰苦。信中虽然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但言下之意是想得到江青的一点帮助。江青每次看完信以后都置之不理，一不回信，二不回话。

一开始，我不知道李云露和江青是什么关系。有一天，我好奇地问江青的老厨师程汝明，他告诉我，李云露是江青的亲姐姐，以前住在中南海，给江青做家务，带孩子，以后得罪了江青，江青一气之下，就把她赶出了中南海。从此以后，江青再也不认这个姐姐了，没有任何来往。

1972年5月，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生了孩子，又雇了一个保姆。既要给孩子买牛奶，又要付保姆费，李讷的工资低，钱不够用，生活很困难。1973年，李讷将她的困难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汇报了，请求爸爸给予帮助。她说：“我不敢跟爸爸说，怕爸爸说我不过不了艰苦的生活，请张叔叔跟爸爸说。”张耀祠很同情李讷，如实地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同意给予李讷帮助，并问张耀祠给多少钱合适呢？张耀祠鼓着勇气说：“那就给8000元吧。”毛泽东想了一想说：“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个人给8000元，平均吧。”

于是，主席批了一个条子，从他的稿费里取出了32000元人民币，给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人8000元。当时贺子珍正在解放军301医院住院治疗，她说：“我看病的医疗费公家能报销，不缺钱用，把钱全部退给主席吧。”并说：“谢谢主席对我的关心。”后来经过做工作，她把钱收下了。出院结账时，不能报销的自费药有3000多元，这个费用就是从毛泽东给她的钱中支付的，剩下的4000多元，贺子珍退给了毛泽东，并一再向毛泽东表示感谢。江青则毫不客气地收下了。给李讷的8000元，毛泽东的管理人员吴连登只交给了她3000元，另外5000元帮她存入了银行，一是存在银行还有点利息收入，二是叫她慢慢用，如果很快就用完了，再向主席要就困难了。

一直对李云露不理不睬的江青，在毛泽东去世之前，突然想起要关心一下她的姐姐。于是，立即派厨师程汝明代表她去看望，看看姐姐生活过得如何，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助。

当时，李云露住在清华大学一间平房内，她与程汝明在中南海就认识了。见到程师傅时，她很高兴，也很激动，双眼含泪，询问江青的身体怎么样？工作忙不忙？李讷好不好？她说李讷是我带大的，很想念她，很想见见李讷。

程师傅一边回答李云露提出的问题，一边环视屋内的情况：床上的被褥比较破旧，屋内生着一个煤炉，烧过的煤球和没有烧过的煤球都堆在地上，凌乱不堪。屋内的温度也不高。程师傅看到这些情况后感到一阵阵心酸，心想，姐妹俩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了。李云露离开中南海以后，江青从未关照过她，日子过成这个样子。李云露是一个好强的人，程师傅问她生活有什么要求时，她摇摇头，说没有要求，希望江青、李讷注意身体。

程师傅回到钓鱼台以后，将他看到的情况向江青如实地作了汇报。江青说，请程师傅再去一趟，从我的存款里（江青没有什么存款，她指的存款是毛泽东给她的8000元钱），送给她5000元钱，以帮助她的困难生活，也算了结我的一个心愿，还了债。程师傅及时办理了，这使得李云露感激不尽。毛泽东去世以后，江青感到用钱紧张，又想把送给她姐姐的5000元钱要回来。程汝明和吴连登劝说江青不能再要了，钱已送出去了，再要回来影响不好。江青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这才没去要。

◇ 哥哥李干卿辛酸的求见

江青还有一个哥哥叫李干卿，1901年3月13日出生，比江青大十三岁，“文革”期间在济南火车站工作。

1970年春天，李干卿带着他的小儿子来到北京求见江青，中央办公厅把他们父子安排在中直招待所住下。

一天下午，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给我打电话，叫我报告江青，说她的哥哥和侄儿来北京了，要求见见江青，见与不见由她决定，“他们现在住在中直招待所，她要见的话，你给中直招待所的领导打个电话通知她哥哥”。我将此事报告江青以后，她两眼紧闭，思索了好大一会儿，才犹豫不决地对我说：“这事难办，他们对我搞突然袭击，来以前也不来信问问我让不让他们来北京，这叫私闯京城啊！既然这样，告诉他们，我工作很忙，不能见，立即叫他们回去。”

“好，我立即通知中直招待所打发他们回原籍。”我说完转身就走。

“你站住！还不能这样说。”江青说，“他不是带了一个孩子吗？你请汪东兴派人到主席的

礼品库里找一架最次的照相机，送给孩子，再带上半斤茶叶送给他的父亲，他好喝茶。告诉他们我现在工作太忙，我抽不出时间见他们，叫他们赶快回去，他们来北京找我不就是要点东西吗？真是穷疯了，他们看到我送的东西，自然就会回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趁江青睡觉的时候，带上江青的“礼品”来到中直招待所，看到了李干卿他们父子二人。李干卿胖胖的，身体很结实，他儿子十五六岁，长得满精神。自我介绍以后，我说明了江青不能见他们的原因，请他们早点回山东，并把江青送给他们的“礼物”交给了他们。

他的儿子毕竟还是孩子，看到照相机觉得很新鲜，专心致志地摆弄着玩。

江青的哥哥听我转达江青的话以后，流下了眼泪，双手托着两腮很久没有说话。

我临走时，他忙站起来，双手握着我的手恳求说：“我这样大的年纪了，这次恐怕是最后一次来北京了，今后再也不会见到江青了。请麻烦你再跟她说说，请她见我们父子一次吧，拜托你了。”

我同情地说：“可以，我再向她请示请示，能见你们更好，不见，我也没有办法。我报告她以后，她有什么话对你们说，我通过招待所的领导转告你们。”

李干卿连连说道：“谢谢，谢谢！”

回到钓鱼台后，已经夜里11点了。躺在床上刚迷糊着，江青就打铃起床了，我又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江青到了办公室，我把李干卿想见她一面的请求报告她。她说：“这老东西真不识时务，他还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解放以前他当过国民党的兵，解放以后被我们的人民政府审查和管教过，像他这样的人还有脸要求见我，真自不量力！我现在是政治局委员，如果会见一个曾为国民党扛过枪，与人民为敌，被人民政府镇压过的人，那我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她咬牙切齿地说：“你叫招待所的同志通知他，我还是不见，立即叫他们回去，不能在北京久留！”

江青对我解释说：“现在阶级斗争这样复杂激烈，他们在北京呆久了，对我是不利的，会影响我的。我没有钱给他们买火车票，叫他们自己买票回去，他们能自己来，就能自己走。”

据我了解，江青说的李干卿被审查和管教的事是这样的：1953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铁道部公安局曾调查过在济南铁路局供职的李干卿，但由于他是江青的哥哥，没敢查下去。1959年江青要接李干卿到中南海，公安部中南海警卫局便责令山东公安厅正儿八经地查下去了。调查的结果是，李干卿曾在军阀张宗昌的部队当过“师爷”，即文书，日伪和国民党时期曾任过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巡防组组长等职务。1939年，在日本宪兵队的威逼下，李干卿曾写信给江青进行策反。1945年李干卿曾入室抢夺王虎牌手枪一支。1948年至1951年偷窃过面粉，贪污大米、鸡蛋及数百万元（相当于现在的数百元）人民币。李干卿的劣迹颇多，在“三反”期间受过处分。

后来，事情闹大了，发展成了李干卿事件。因为对李干卿的调查激怒了江青，江青便在“文革”中进行报复，陈伯达称“这是阴谋陷害江青同志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哭着说：“我哥哥李干卿过去很苦，为了糊口在旧社会干了几家警察，他们就对他，对我，其实是对着我们的毛主席呀！”随即陈伯达、江青从北京派出三人到济南把山东省公安厅

厅长张国锋、副厅长李秉正、交际处处长陈静波、警卫处处长于杰、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等六人全部逮捕。除张国锋身患癌症外，其余五人用专机押送北京，受尽折磨，这桩案子到1977年才得到平反。

我不明白，一直为其哥哥鸣冤叫屈的江青，怎么一下子变了脸色，对李干卿的到来无动于衷。

我按照江青的指示，打电话给招待所的领导同志，动员他们父子回去。江青的哥哥接到第二道叫他们回去的命令以后，再次留下了伤心的眼泪，但仍坚持不离开北京，继续等待江青的接见。

大约过了两天，江青叫我打电话问问中直招待所她哥哥离开北京了没有？我打电话问招待所，招待所的同志说，还没有走。

这时，江青心里很矛盾：不见吧，他们执意不走，在北京住的时间长了，对她影响不好；见吧，又怕别人说她阶级界限不清。经过思想斗争，她决定还是见一面，赶快把他们打发走。为了避嫌，江青叫我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请他报告主席她哥哥来求见的事，并请示“我见他们一面好，还是不见好”。

毛泽东回答说：“为什么不见？国际战犯都能改造好，国民党的高级人物我都可以见，难道你的亲兄长都不敢见吗？你不能六亲不认吧！见，一定要见。”

当我把主席的话报告给江青以后，她决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父子。江青说：“像他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没有资格进中南海和钓鱼台，在大会堂见一见，就够抬举他的了。”

会见时，面对多年未见面的哥哥，江青没有表现出一丁点想念之情，反而像训斥小孩子一样，疾言厉色地教训了一番。

她说：“你们到北京来，为什么事先不向我请示汇报？你们这是逼着我见，搞突然袭击。像你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不能乱跑，更不该私自到北京来。你一来搞得我很被动。从今以后不许你再来北京，你今天立即离开北京。”

李干卿虽然受到了妹妹的训斥，但是终于见到了身居高位的亲妹妹，还是很高兴的，并没有提任何要求。他激动地对江青说：“我知道你工作很忙，可是，我实在是想念你，这个孩子没有见过你这个亲姑姑，常常念叨见你，今天见到了，我们明天就走。”说着说着，又流下了泪水。他用颤抖的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不太干净的手绢擦了擦眼泪。江青还没有等他擦完，站起来，头都没有回一下就走了。

◇ 江青与毛岸英、毛岸青

江青孤独的童年，形成了她独特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对人漠不关心的怪癖性格。在家庭中她没有最亲近的人，在工作环境中她没有最好的朋友，在人际交往中没有知己。她和她的子女们关系都不融洽。

毛岸英是毛泽东和杨开慧所生，是毛泽东很喜爱的长子，童年很苦，和母亲一起坐过国民党的监牢。母亲壮烈牺牲后，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一起以卖报纸、捡破烂为生。在党的地下组织的关怀下，艰难地回到父亲的身边，后来到苏联留学。

1946年2月，毛岸英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回到延安。一天下午，毛岸英来到毛家坪，向爸爸汇报在国外学习的情况。毛泽东听了以后，高兴地说：“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但学的都是书本上的知识，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上另外一所大学，这个大学就是‘劳动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送你去好吗？”“好，很好。”毛岸英非常爽快地答道。临走时，毛泽东把自己打过补丁的一套灰布衣服给他穿上，一再嘱咐他到了乡下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虚心向群众学习。毛岸英遵照父亲的嘱咐，背着小米、菜籽和被子去上“劳动大学”。到了乡下，积极参加了生产劳动，运肥，耕耘，除草，浇水，收割，样样农活都抢着干，不懂的虚心向农民请教。毛岸英“劳动大学”毕业，脊背晒得黝黑黝黑的。毛泽东看到后，又听了儿子劳动锻炼的情况汇报，高兴得很。

毛岸英是一个非常听父亲的话又非常要强的好青年。以后他又到工厂做工，解放后在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支部副书记，雄心勃勃，血气方刚，很想干出一番事业来。朝鲜战争爆发，他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立即递交了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申请书。恰巧此时，彭德怀赴京向毛泽东汇报志愿军总部组建工作。毛泽东便把毛岸英交给了彭德怀，要他带岸英到朝鲜去经受战火的考验。就这样，毛岸英离开了生他养他的祖国和他最敬重的爸爸，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1950年11月25日，志愿军打响第二战役的第一天，美机轰炸志愿军总部，毛岸英不幸牺牲。

江青只比毛岸英大7岁，从江青进入毛氏家庭以后，就和岸英的关系不好。江青曾跟我们说过：“毛岸英是主席最宠爱的孩子，这我不反对，父亲爱孩子是理所当然的，无可非议。但是，毛岸英认为自己有文化，懂知识，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脾气很暴躁，动不动就和我吵架。我虽然大不了他几岁，但从辈分上讲我还是她的继母嘛。每次吵架，主席总是批评我，让着他，这样，他对我就更加放肆了，更不尊重了。有时，我们见了面他连话都懒得说一句，把脖子一歪走开了。哎，人都不在了还说他干什么，对过去特别不愉快的事情难以忘记，不想讲的事，又不由自主地讲出来了，还讲给你们这些孩子听，不必要。”

江青讨厌毛岸英是不足为奇的：一是因为岸英不是她亲生的；二是毛泽东喜欢岸英，江青嫉妒；三是根据中国的文化传统，长子在家庭中的身份和地位特殊，这对江青野心的发展，是一种障碍和威胁。

赴朝作战前夕，毛岸英与刘松林结了婚，刘不久在军队得到了一份称心的工作。他们的爱情深厚，日子过得很美满。而江青与刘松林的关系很不好，刘松林说过，江青从一开始就对她“蔑视、嘲讽、侮辱”。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毛泽东失去了亲爱的儿子，难过地掉下了眼泪，江青口中却经常哼着小曲子。刘松林说，岸英之死使江青感到“无限的狂喜”。毛岸英的葬礼，江青没有参加。而且，江青慢慢地对刘松林施加各种压力，逼她搬出中南海。后来，江青又没收了刘松林进出中南海大院的通行证。

刘松林听到毛泽东和江青争论她的前途问题。江青坚持取消给刘松林的生活补贴，毛泽东愤怒地对江青说：“只要我有一口气，我就要照顾刘松林。”毛泽东和刘松林谈话，抱怨江青的唠唠叨叨，抱怨她对毛岸英没有感情。他气愤地来回踱步，走到书架前，取出一本古书，给松林读了一篇描写树木河流的浪漫的散文：“树老了，落叶飘零，慢慢地倒下死去；旁边长期陪伴着它的河流，为大树的死去黯然神伤，慢慢地停滞了，干涸了。”毛泽东告诉松林，江青对这个家的感情，还不如河流对大树的感情。毛岸英对江青冷酷的心，非常反感。岸英赴朝参战前夕对刘松林说：“我走了，你出院后，每个礼拜六要去看看爸爸，不要我不在你就去了。”

岸英又对刘松林说：“江青只顾她自个儿，根本不照顾岸青，她不爱我爸爸。我曾骂过她，说既然你不爱我爸爸，滚开就是了，何必赖在这里。你也得小心，她这个人是很记仇的……”

使江青最感到讨厌的还是毛岸青。岸青曾被人打伤过头部，大脑受过损伤，心理状况一直不好。毛岸英在朝鲜牺牲，对岸青的精神造成了进一步打击，1951年秋季发过一次比较厉害的精神分裂症。当时，他在中央马列研究所工作，在办公室里与人吵架，发脾气。父亲把岸青叫到中南海，开导他，想缓和一下他的情绪，恢复精神健康。江青却对毛岸青横眉竖眼地进行训斥，并把他关进一间屋里。岸青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后来，岸青被送到大连的某医院进行治疗。在那里，他爱上了一位姓徐的护士。江青大为恼火，坚决反对他搞对象。于是，江青提议把他送到苏联去养病。岸青在莫斯科又爱上了一位苏联护士。这一次，江青一反常态，出人意料地表态，岸青应该与那位苏联护士结婚。她是想叫岸青在苏联定居，这样永远不会再惹出什么麻烦，去掉一块心病。本来很吝啬、一毛不拔的江青，却把项链和衣料送到莫斯科，作为礼物送给未来的新娘。遗憾的是这桩婚事没有成功。

江青听到岸青与刘松林的妹妹邵华相爱的消息，如晴天霹雳，坚决抵制。江青开始控制岸青寄往中南海的信件，扣下很多，并烧毁一部分。毛泽东发觉后，给岸青写信：“你写给我的信，不要经过他人，最好叫松林、邵华或李敏转交给我。”毛泽东说的他人显然指的是江青。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岸青与邵华结了婚。为此，江青好几年没有和岸青说话。

江青阻止、反对岸青与邵华的婚事是显而易见的，她是怕他们结婚后会在毛家增强“杨开慧的势力”。江青这种怀疑使家中本来紧张的关系又进一步恶化。

□ 《同舟共进》2010年第6期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